责编：沈辉 E-mail:zydxshenhui@2008.sina.com Tel:010—62806418

◆观 点

不动产统一登记的多重正效应

建立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对一些官员的个人既得利益具有杀伤力，对地方的整体利益却具有增进之效。

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酝酿有年，但此前推进缓慢。原因是，它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多重效应。明晰的不动产名录，既可为反腐提供有效的信息支持，也能对滋生于土地市场的不当寻租行为产生威慑作用。但也正因为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涉及利益格局的核心地带，而遭遇种种阻力。此前曾给出时间表的重点城市房产信息系统，最后无疾而终，已经反映出建立不动产信息库的难度。

在国土资源部双管齐下的推动下，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有望真正启动。但不能不担心，是否还会遭到来自各方面的软硬阻力。毕竟，土地中的利益格局已有固化趋势，维护自身利益，总能迸发出巨大能量。如果缺乏清楚的认知和刚性的执行力度，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的建立及其真实性就可能是脆弱的。

要看到，建立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对一些官员的个人既得利益具有杀伤力，对地方的整体利益却具有增进之效。此前，以价格控制为主要目标的调控方式已反复显示出其与市场真实运行情况的不协调之处，并造成了越调越涨的惯性循环。转换楼市调控思维，建立长效调控机制，已是必然要求。建立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能为今后建立房地产市场稳定、长期的税收体系奠定基础，减少设置和征收相关税种的成本，有利于地方获得长期稳定的税源。

还要看到，出于对这一制度的政策预期，可以调节人们对房市的价格预期，甚至迫使拥有多套房源的特殊群体将多余存量房投入市场。供应量增加将改变现有供需状态，成为抑制房价上涨的因素。这对仍有控制房价任务的地方政府来说，也是助益。

与此前不同，此次建立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的时机较好，能获得更多权威的政治支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已提出，尽快推进房地产税研究进程，并强调了税收法定原则。建立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是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应有动作。此外，《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和国务院第31次常务会议，也就建立相关统一登记机构和登记依据提出了具体要求。这意味着，建立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进程将加快，楼市长效调控架构正趋明晰。剩下的关键是，如何让具体负责登记制度的基层政府，实现与这一部署的更高配合度，并对登记数据的真实性，建立有效甄别机制。（2014年1月13日《京华时报》徐立凡）

勿用“职业风险”解读“辞官”现象

“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曾是描绘高考惨烈场景的经典名句，后来，通往高校的道路不再是“独木桥”了，这话转而被用来描述年甚一年的公务员招考。在这样的背景下，最近媒体关注的公务员辞职现象与之形成鲜明对比，自然引来各方热议。

官员辞去公职何以总是成为新闻？原因在于人们骨子里官本位观念根深蒂固，这种价值取向和评价标准，习惯把社会现实生生地分割为所谓“体制内”和“体制外”，并且偏执地尊崇“内”而低视“外”。或因如此，百万人参加公务员考试的壮观情形让人见惯不惊，不时出现的公务员辞职却令人惊诧莫名。

虽然现在这两种方向相反的流动还远远形不成均势，但辞官现象蕴含和释放的积极意义却值得关注和肯定。这是社会价值取向多样化带来的可喜结果，这一趋势的发展和加强，从宏观层面讲，有助于优化社会人力资源配置，从微观角度看，有助于个体实现相对自由的选择。显然，这是在增强社会活力与创造力，甚至极而言之，出现一定规模的公职人员向社会流动，某种程度上是衡量政府与市场关系重新定位和社会转型升级是否到位的直观表征。

但有一种观点却过分从职业风险角度来解读辞官现象，将其作为官员从业风险性明显增高的直接证明。确实，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力度的空前加大，短时间内即令民意伸张、民心振奋，也使“官员已成高风险职业”这个似是而非的判断颇受认同。支撑它的基本事实，就是官员频频落马和公务人员辞官转行。

其实，从官员频频落马现象得出官员职业高风险性的结论，逻辑上是荒谬的。官员落马的层级在提升、数量在增多、频率在加快，既说明反腐形势的严峻性和斗争的艰巨性，更表明执政者遏制腐败蔓延的意志在强化，力度在加大，效能在提高，却与官员职业本身的风险性实在无关。衡量一种职业的风险性，应该基于从业人员在正常履职状态和过程中出现风险的可能性，如果从业者“不正常”履职，逾越了规矩，那么这种风险实际上是他自己主动制造的，而非职业本身所具有。廉洁从政本来就是公职人员的职业底线，做到了“为民、务实、清廉”的基本要求，何来落马风险？

因此，将所谓的官员职业风险增高作为辞官现象的原因，逻辑起点就有问题，而且隐含着对特定人群的“有罪”推定，似乎为官就是为了安全地谋取不当利益，辞官就是为了逃避查处，将正常的个人择业行为贴上道德标签。当然，如何防范“利益期权”，防止辞官人员利用先前影响力非法牟利等，确实需要高度重视，但那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充分尊重和保障每个人的职业选择，同时致力于畅通公务员进出通道，完善相关制度体系，使覆盖各个领域和环节的监管更具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制度执行更加科学、刚性、高效，这才是有效治理的根本之道。一个高度法治的国家，无论是权利保障，还是违法追惩，都无所谓“体制内”“体制外”的分野，没有法外之地，没有法外之人。也许到了那时，各方才会真以平常心来看待官场“围城”的进进出出，而不必大惊小怪、危言耸听。（2014年1月13日《成都商报》杨晓阳）

◆纵 横

做人难得腰不变

一个人生理与心理变化密切相关，就说“腰”的变化， 就与人的荣辱升降、奖惩褒贬息息相通，很能反映出不同人在不同环境下的微妙心态：受到表扬昂首挺腰，遭到批评低头哈腰；春风得意摆头晃腰，仕途坎坷叹气捶腰；给下级训话两手叉腰，迎上司检查垂手弯腰；有利可图探着腰，无所事事伸懒腰，碰到困难就转腰。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而对“腰”的变化观察细致的莫过于裁缝。以前有这样一个说法：有些人刚任要职，趾高气扬，挺胸腆肚，这样衣服要裁得后短前长；两年以后，意气平和，前后要裁得长短相等；三四年后，天长日久，官不获升，便巴结上司，整日腰变得像虾米一般，衣服则要裁得前短后长了。这可谓深谙官场中的玄妙。

古往今来，世间那些为求一己富贵安逸而变“腰”者，数不胜数：五代时的张全义，在朱温“官”饵引诱下，弯腰把自己的老婆、小老婆和女儿都恭恭敬敬亲自送上门。春秋时易牙为满足齐桓公的食欲，弯腰把自己的儿子蒸了，做成美味献给主子吃。新中国成立以来，有些为官者在金钱面前变了腰，蜕化变质，堕落成人民的罪人。一些高级干部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经不住金钱美女的诱惑而变了腰，以权谋私，贪赃枉法，结果身陷囹圄，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

自古以来，在出现这些为名利权位而变腰的民族败类的同时，也出现了“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民族脊梁。李白不愿“摧眉折腰事权贵”；文天祥“留取丹心照汗青”；鲁迅嫉恶如仇，“横眉冷对千夫指”；刘胡兰面对铡刀腰不弯，慷慨就义；贺龙面对高官厚禄的诱惑不变腰，毅然投奔共产党，为穷人求解放；很多老一辈革命家在“文革”期间，面对“四人帮”的淫威腰不弯，保持了革命晚节，等等。

不因贫困而摧眉折腰，不因腾达而腆肚挺腰，不因求功利而点头哈腰，是做一个正直的人所应该追求的。特别是今天我国处在经济大发展的时代，保持一身正气而腰不变，这才是难能可贵的。（2014年1月8日《人民日报》陈思炳）

◆文 坛

读完一本书

清朝咸丰年间，吴县（今江苏苏州）有一个人中了进士，以翰林编修进入南书房任职，类似于现在的书目编辑。一天，咸丰皇帝询问他：“你闲暇时常用什么方式消磨时间？”这人回答道：“我闲暇的时候读《汉书》。”

恰巧咸丰皇帝当时也在读《汉书》，听到他的回答很高兴。因此便谈起书中说诗解颐的内容，谁知这个人原来并没有读《汉书》，一时间惊慌失措，答不出皇帝的问题。咸丰皇帝顿时感到非常恼火，命令他回到原籍读3年《汉书》再来复职。

这人回到家乡以后，悠闲地生活了3年，回京复职。不久他又被咸丰皇帝召见，他估摸着皇帝日理万机，早把自己以前的事情忘在脑后了。哪知咸丰皇帝记忆力超强，还记得上次命他读书的事情，说：“你不是上次回乡读《汉书》的那个编修吗？”他不禁惊恐万状，战战兢兢地说：“是的。”

“那么党锢案所涉及的人物你能全说出来吗？”咸丰紧接着问道。不想那人却说：“我所读的是《前汉书》，这段历史好像在《后汉书》，我还没来得及读。”《汉书》的确是有《前汉书》《后汉书》。《后汉书》中增加了《党锢传》《列女传》等七个类传。看来他回乡这3年的确是读书了，但想来也只是不求甚解地扫视了一遍。结果可想而知，他又像上次那样回家了。

俗话说事不过三。这次他终于在家发奋读书，通读了两部《汉书》并且从中学习到治理天下之道。这个人叫作冯桂芬，是林则徐的门生，晚清著名的思想家、散文家，最早提出了“中体西用”的指导思想。

我们不妨环顾一下四周，会发现身边也不乏这样的朋友，经常说自己读了多少本书，时常在朋友圈“晒一晒”自己读的书。可是仔细一问，往往很多书也就是只知道个书名或者是蜻蜓点水般地翻看了几页而已。每每到了真需要用的时候，恐怕就像冯桂芬那样直接露馅了。

究其原因，这些人或是为了炫耀，或是为了撑面子。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读书不是为了炫耀，也不应该怕丢面子，而是为了丰富我们的学识，提升我们灵魂的高度。只有不急功近利地潜心读书、感悟，才能在一片书页中看到一个世界。在这个快餐化阅读的时代，用心读完一本书，就如同细细地品一盏茶，回味无穷。（2014年1月11日《光明日报》王江江）

◆史海钩沉

范仲淹的“三板斧”

北宋著名良吏范仲淹（公元989年—1052年），曾被王安石评为“一世之师”。然观其一生，亦无非寻常的“三板斧”而已，招数并不复杂，目下人人皆会，人人可会，不同之处唯在于，范仲淹不屈不挠地使了，且斧斧生猛，力道惊人。

第一斧：划粥断齑，立志励志。范仲淹是江苏吴县人，出身贫苦。由于母亲改嫁富裕的朱家，范仲淹也改从其姓，取名朱说，在朱家长大成人。但他少有志向，存“天下之忧”，所以读书非常刻苦。为了磨炼自己的意志，他常常有意放弃优渥的生活条件，寄宿寺庙，每天只煮一碗稠粥，凉了以后划成四块，早晚各取两块，拌几根腌菜，吃完继续读书，赢得了划粥断齑的美誉。

“士人有百折不回之真心，才有万变不穷之妙用。”下真功夫营养灵魂，下硬功夫陶冶精神，心地纯洁澄明，高尚品德随身附体，就站得稳，走得正，干得好。范仲淹入仕之后的所作所为，莫不与注重磨炼身心有关。比如：他入仕以后，平日没有宾客登门，是不准上两样荤菜的。到了晚年，儿子准备为他修建大宅院，被他断然拒绝。有人要替他在洛阳买一座叫作“绿野堂”的园林，他照样不肯，并说：“一旦取其物而有之，如何得安？”晚年，他还谆谆教诫子弟要节俭，家书中这样提醒：“老夫平生屡经风波，惟能忍穷，故得免祸。”

秉真持正，不以妄心害真心，不当贪官、庸官、懒官、昏官，坚守廉洁从政、为国为民的精神家园，才干必会大放异彩。

第二斧：死磕权贵，遏制歪风。范仲淹为官30余年，四次被贬，前三次都是因为敢于直谏说真话引起的。

宋仁宗年幼时，刘太后“垂帘听政”。后来仁宗满了20岁，刘太后仍然不放权。对此，朝内大小官员都不敢吭声，独范仲淹站了出来，上奏折要求刘太后按祖制让位给仁宗。迷恋权力的刘太后看了折子大怒，立即下旨，把范仲淹贬到一个边远小县做通判。

刘太后去世后，范仲淹被召回京城重新起用。此时，宰相吕夷简任人唯亲，结党营私，贪赃枉法，把朝廷弄得乌烟瘴气。范仲淹又开始跟吕夷简死磕，他经过深入调查，绘制了一幅《百官图》送给皇上，具体揭露了吕夷简安插亲信的种种罪行。不料吕夷简倚仗权势，恶毒反诬。最终，范仲淹未能把作恶多端的吕夷简扳倒，自己反而再次被贬，到睦州做了知州。

他在京城做右司谏时，有一年江淮灾情严重，数路饥馑，朝廷派他视察灾情，安抚江淮，他马不停蹄，日夜兼程，令淮数郡“开仓廪，赈乏绝”，并且把饥民吃的“乌昧草”带回京师，让仁宗皇帝及大臣们看，恳请皇帝和朝中大臣减盛宴、去奢华，节衣缩食，体恤灾民。

范仲淹一生始终坚持正义立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他在一首题为《灵乌赋》的词中，抒述自己绝不退却的激愤心情，有两句话掷地有声：“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意思是说，他宁愿为正义呼声而死，绝不默默地苟且偷生。这是何等可贵的精神！

第三斧：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范仲淹最大的亮点，就在于不管自己升官降官，每到一地，总要千方百计兴利除弊，做出几桩惠及地方的事情来。

早年在泰州做盐仓监官，无聊到极点，他曾写诗自嘲：“卑牺曾未托椅梧，敢议雄心万里途！蒙叟自当齐黑白，于牟何必怨江湖，一醉一吟疏懒甚，溪人能信解嘲无？”然而，他很快发现，这么下去不行，既然做官，就要给百姓做些实实在在的事儿。于是，那几年，他为苏北人民留下了“范公堤”。

他谪贬睦州，不到半年，就倡导修建“严子陵钓台”，向世人高扬“使贪夫廉，懦夫立”的钓台之风；做苏州太守时，他买下南园，创办学府，为国育才。对那些不称职的下属官吏，一旦查清，他便毫不留情地将其姓名从官吏名册上划掉。即使达官显宦，亲朋好友从中劝说，他也坚持到底，不为所动。“一笔勾销”的佳话，至今流传。他发动的庆历新政，几乎触及当时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虽然由于守旧势力的反对而最终失败，但却开创了北宋士大夫敢于议政的风气，传播了改革思想，成为王安石熙宁变法之前奏。

大道若简，至理也，放诸四海皆准。

如今在官德教育、廉政建设等文化实践中，我们也会发现，过于繁杂的说教，大会小会不断地开，左一个文件右一个文件地下达，远不如一个实例、一道政令、一次身体力行来得有效。范仲淹的“三板斧”，其史鉴价值在于：修剪冗枝，去残枝败叶，除疯枝病桠，大树才能茁壮生长，成参天之材；不攀比、不折腾，不摆阔、不奢靡，走正道，官员才会有底蕴和政声。（2014年1月10日《北京晨报》赵炎）

（上接第1版）

“容”是指展示开放包容、求同存异的大国胸怀。中国一向支持东盟在地区合作中发挥主导作用，欢迎域外国家参与到东亚地区的合作机制中来并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10+1、10+3、东亚峰会等各机制相互补充和促进。我们积极回应各国对亚太地区安全问题的关切，推进地区防务安全领域的交流，谋求与周边国家的共同安全与合作安全。我们搞大国外交，就要培养我们的大国心态、树立我们的大国情怀、体现我们的大国气度，特别是对待中小国家和邻国更应如此。

同时，我们要坚决维护周边地区的和平稳定。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我们要坚持推进半岛无核化进程，坚持通过对话解决问题，坚持维护半岛和平与稳定。中方决不允许在我们家门口生乱生事，决不接受中国的发展进程再度受到干扰和打断。

当前中日关系的困难局面是日方引发和造成的，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日方应正视现实，谨言慎行，不要再做有损中国主权权益的事情。历史问题至今仍是不时干扰中日关系的主要因素之一。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只有以史为鉴，才能开辟未来，只有坚持和平走向，才能真正得到邻国信任。日本方面应该懂得这一基本的道理，切实尊重人类良知和公理的底线。

要深化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夯实我国和平发展的牢固基础。在国际交往尤其是与发展中国家打交道时，如何处理义和利的关系，是观察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一个重要视角。习近平总书记总结我国历史经验和新中国外交传统，明确提出要坚持正确义利观，强调我们要促进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对贫穷的国家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有时甚至要重义轻利、舍利取义，绝不能唯利是图、斤斤计较。

广大发展中国家是我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同路人。我们要积极践行正确义利观，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援助，深入挖掘与发展中国家开展互利合作的新机遇，探索合作的新方式，切实帮助他们实现自主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要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提供我国和平发展的公共产品。随着国力不断增强，中国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和义务，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中国是世界和平事业的坚定维护者。我们坚决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反对外部势力无理干涉别国尤其是中小国家的内政。中国是国际发展事业的大力推动者，我们积极致力于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认真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发出中国声音，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一个和平发展、更为强大的中国必将为人类的和平与进步事业承担更多的责任，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

要建设强大国防维护国家利益，构筑我国和平发展的坚实保障。和平发展不可能一帆风顺，还会遇到很多风险和挑战，需要不断排除和化解各种干扰与阻力。要把和平发展道路走通，走到底，必须建设强大的国防。国防实力的增强，不仅能切实维护好我国的核心利益，使我们能够更加集中精力于和平发展，也将对任何破坏中国和平发展进程的挑衅形成有力威慑，达到“以武止戈”、避免战争的目的。中国坚持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中国越发展壮大，包括进一步加强国防建设，越是和平力量的增长，越有利于世界和平。

中国的发展不会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同时，我们也不允许中国的正当权益受到侵犯。如果有人误以为我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怕惹事，肆意向我们挑衅，结果必将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们在坚持自身和平发展的同时，也要倡导其他国家都走和平发展道路，使和平发展成为各国共同的政策取向。

要让广大人民群众得到更多的收益，强化我国和平发展的民意支撑。中国外交只有植根人民，造福人民，才能得到人民的信任与支持，获得前进的动力。长期以来，我们通过和平发展壮大了自己，越来越有能力维护好海外公民的合法权益。我们要贯彻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打造好海外民生工程，不断改善和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我们还要尽可能和更多国家签订相互简化签证直至互免签证的协议，使手持中国护照的中国公民到海外旅行更为快捷舒适，让更多外国民众更方便感知中国，了解中国，这样就能不断扩大支持我国和平发展的民意基础。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100号 邮政编码：100091 社长兼总编辑：谢春涛 常务副总编辑：钟国兴 广告部电话：62805980 62806380 发行部电话：62806227 兼传真 总编室电话：62805368 62806234 电子信箱：xuexishibao@126.com
定价：全年180元 邮发代号：1—267 国外发行代号：W3970 开户银行：建行北京中关村分行 户名：中共中央党校报刊社 账号：2613000456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京海工商广字0301号 承印：人民日报社印刷厂